

帝國凝視——「臺展」之前日人「臺灣知識」的建構

賴明珠

The Imperial Gaze: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Knowledge” by Japanese before the “Taiwan Fine Arts Exhibition” / Lai, Ming-Chu

摘要

「臺展」於 1927 年開辦，當時殖民高階統治官員於開幕時的政治修辭，包括「帝國異彩」、「南國美術」、「臺灣特質」，甚至更明確的「地方色彩」口號式策略，顯然隨即在臺、日籍畫家間發酵。大家不約而同，似乎有共識地，紛紛採用具有臺灣風物特色的素材入畫。這樣的集體反映，顯示 1927 年之前臺灣的殖民邊境定位與帝國地方意象，早已存在於臺人及滯臺日人的意識層中。本文將追溯日本人領臺前後的臺灣認知，領臺後的統治論，以及日人在臺推動慣習調查，對「臺灣知識」脈絡化的影響歷程。同時也嘗試探索，在帝國凝視下所建構的「殖民邊境」論述系統，對日後視覺表現模式產生的漣漪效應。

關鍵字：地方色彩、殖民邊境、臺灣風物、尊重舊慣、異國趣味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一、前言

滿清朝廷於甲午戰爭慘敗後，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正式簽署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統轄臺灣 32 年後，日本殖民政府於 1927 年 10 月在臺開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並由臺灣總督、總務長官及文教局長分別昭示：「本島天候地理自成一特色，……應培育之，灌溉之，……為帝國添異彩」¹；「本島具有獨特的自然，以此為表現的藝術乃別具特色，……將闢築成燦然奪目的南國美術殿堂」²；「亞熱帶的本島，在藝術上足以發揮的特色很多，……期待能納入臺灣的特質，以發揚灣展的權威。……將蓬萊島的人情、風俗及其他事情廣泛介紹給社會」³。從位居總督府統治階層高階殖民官員的政治修辭，可以確認被視為日本帝國南方疆域的臺灣，因其特殊的地理景觀、風俗民情及生活慣習等，包括自然與人文的風土，在統治中後期，即將被帝國霸權進一步建構為「殖民邊境」(colonial frontier)的視覺性美術文本。所謂「殖民邊境」，依據美國語言文學研究學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一書，討論帝國殖民知識結構與權力關係時提到，殖民地帝國的「殖民邊境」乃是「歐洲擴張主義者的觀點」。而她本身，則寧可使用另一個同義詞「接觸區」(contact zone)，以「強調互相影響的(foreground the interactive)、即興的(improvisational)殖民邂逅空間(dimensions of colonial encounters)」⁴。然而她也承認這樣的多種族或多文化的接觸，「通常是在權力關係極端不對稱之下」進行的。⁴日本殖民時期所舉辦的「灣展」(臺展)，一開始就強調要「納入臺灣的特質」，以臺灣的自然人文風土作為入畫的素材。但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美術指導方針，到底是如殖民政權所預期地，建立了帝國殖民邊境的藝術呢？還是同時也創造出不同種族、文化的即興、邂逅空間呢？

臺灣總督府將帝國邊境的自然歷史特徵，型塑成已被日本馴化的知識體系，並且將強調臺灣風土人文特色的「地方色彩(ローカルカラ)」口號，列為官展創作內容與思索的導航方向。「臺展」與後續的「府展」(「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的簡稱)之創設，以及「地方色彩」策略的提倡，確實也成為影響臺灣近代美術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官展的設置是總督府運用現代化的展覽機制，進行視覺文化場域權力的重新分配；而「地方色彩」方針的擬定，則是對繪畫創作的實

¹ 上山滿之進，〈上山總督祝辭〉，《臺灣時報》昭和 2 年 11 月號，1927 年 11 月，頁 13。

² 後藤文夫，〈後藤會長式辭〉，《臺灣時報》昭和 2 年 11 月號，1927 年 11 月，頁 15。

³ 石黑英彥，〈臺灣美術展覽會に就いて〉，《臺灣時報》昭和 2 年 5 月號，1927 年 5 月，頁 5-6。

⁴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6-7.

質內容進行改革性地整編。但是操控「地方色彩」、「鄉土藝術」的視覺表現模式，是否完全依照殖民當局所規劃的目標發展呢？還是遠遠逸脫出官方的框架而另闢出即興的邂逅空間？在臺日籍或「灣生」的日本畫家，以及被殖民的臺灣畫家，他們對官方「地方色彩」政策的回應，是否存在著差異性？還有強調地方風土思想內涵的創作理念，在戰後政權移轉的時空下，地方（臺灣）文化在面對另一個中央（中國）文化的牽制下，是否仍在藝術場域中具有生存、抗衡的餘裕空間呢？這又是無數值得持續探索的殖民文化議題。

先行研究者就日治時期「地方色彩」策略對臺灣藝壇的影響效益，其著眼點與評價並不一致。例如，最早注意「地方色彩」議題的王秀雄，分析日、臺籍藝術家對「地方色彩」有迥然不同的取向。他肯定，「地方色彩」作為「一種藝術觀」，鼓勵創作者「勿盲從日本內地『帝展』的路向」，致力於從臺灣取材以發展獨特藝術。⁵但他也發現，許多日籍畫家往往以「新奇與浪漫」的異國情趣目光，進行臺灣與山地風俗的紀錄與描繪。⁶廖瑾瑗認為，「地方色彩」是一種具有政治「同化意圖」的口號，是殖民政府「以日本為臺灣的中央」，要求畫家「觀察、描繪臺灣」。但「地方色彩」口號，卻也促使臺籍畫家產生民族認同的「自覺」，並於 1930 年代初期和臺灣鄉土文學運動「互相呼應」。⁷廖氏更肯定滯臺 28 年的木下靜涯（1889-1988），以東洋畫審查委員身分，帶頭追求「地方色彩」的表現。因而其畫作能夠「掌握自我……主體」，「孕育出……有別於日本中央畫風的風格」。⁸王淑津則強調「地域色彩」具有雙重意義：一、臺灣鄉土藝術是「被擺在日本的美術框架中思考」，日本中央美術才是思考的核心；二、南國色彩具有「在地性的文化意義」，臺灣風土亦是論述的主體。⁹王氏以此論點，評論日籍畫家鹽月桃甫（1886-1954），認為其創作「同時兼有相對於『西洋畫』的日本在地性與相對於『中央』的臺灣地方性兩個面向」。¹⁰王淑津巧妙地從西洋畫君臨日本，以及日本美術移植臺灣的類似歷史情境，況喻「地方色彩」概念潛藏的多層次歷史意涵。而顏娟英則援引殖民的日籍審查委員（如鹽月桃甫）及藝評家（如大澤

⁵ 王秀雄，〈日據時代臺灣官展的發展與風格探釋——兼論其背後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 年，頁 303。

⁶ 同上註，頁 305。

⁷ 廖瑾瑗，〈木下靜涯（1887-1988）與臺灣近代畫壇——以台展、府展的東洋畫部為中心〉，《膠彩畫之淵源、傳承及其影響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暨研討紀錄》，臺中市，臺灣省立美術館，1996 年，頁 57。

⁸ 同上註，頁 61。

⁹ 王淑津，〈高砂圖像——鹽月桃甫的臺灣原住民題材畫作〉，《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 118-119。

¹⁰ 同上註，頁 130。

貞吉及N生)，也對「地方色彩的適當性」產生質疑，並反思官展當局鼓勵以「寫實技法」表現「地方色彩」的實質意義何在？¹¹

從殖民時期日本官方與民間的言論中即可看出，當時對於以何種形式、內容來呈現臺灣的特質或表現地域色彩，殖民官員、滯臺日籍畫家及藝評家，因立場與觀點的差異，他們對「地方色彩」顯然有分歧的詮釋和評價。地方人文風土的觀看，實際上是隨著主體的轉換而不斷地在位移中。觀看「地方」(臺灣)的人，是從中央霸權出發的帝國凝視(empirical gaze)？或是生存在「接觸區」(contact zone)的混雜觀點？還是本土的(autochthonous)、在地的觀照？端看觀者是以何者為主體來定義「地方」。

將臺灣視為蠻荒、未開化的「地方」，指涉它是帝國領土的一部份，是早在日本領臺之前，日本人即已開始論述、建構的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知識體系。為了更進一步瞭解 1927 年「臺展」開辦之前，「地方色彩」概念的緣起，以及它後來在臺灣美術場域產生多樣性分歧詮釋的關鍵因素，本文主旨乃在回溯從明治時期到 1927 年之前，帝國知識份子與殖民文官如何著手研究、論述並定義臺灣和帝國、地方和中央的辯證歷史。作為地方邊境的臺灣之概念，並非「臺展」開辦時才靈光乍現，它的塑形與發展早在日人佔領臺灣之前即已被醞釀。領臺後，在歷經土地、人口、林野、舊慣調查之後，則被廣泛地運用於始政紀念會、產業展覽、博覽會、教科書、旅遊案內等與政治、教育、生活相關的領域中。(圖 1)因而當「地方色彩」口號一出，臺、日籍藝術家們隨即能以各自的理解進行各種以臺灣為名的視覺表現創作。

二、領臺前後日本人的臺灣論

明治維新之後，逐漸強大的日本開始展現向外擴張的野心。1874 年「牡丹社事件」，正是其首度向外用兵，表露覬覦臺灣的企圖心。征臺之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及翻譯官水野遵(1850-1900)等人，¹²曾被派遣到臺灣從事情蒐工作。樺山資紀的《日記》及水野遵的《臺灣征蕃記》，不但記載了臺灣西半部漢人社會的民俗風情，更著墨於觀察、記錄臺灣的原住民人種、生活習俗、建築樣態及自然環境等，¹³堪稱是日人進行臺灣踏查的濫觴。而 1891 年，日本

¹¹ 顏娟英，〈台展時期東洋畫的地方色彩〉，《臺灣東洋畫探源》，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0 年，頁 14-16。

¹² 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 年，頁 40。

¹³ 陳萱，〈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之起源——以牡丹社事件之紀錄為中心〉，《原住民族文獻》第 17 期，2014 年，引自「原住民族文獻」網站，網址：

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也曾奉命到臺灣進行商務的探勘。他所撰寫的〈臺灣視察復命〉，分別記錄劉銘傳治理臺灣時的施政，臺灣的地理、風俗與物產，物產的交易狀況，還有原住民的生活習俗及其與漢人的關係。¹⁴結論中，上野特別強調，物產豐富的臺灣是上天賜予的寶藏地。他呼籲日本當局應該積極關注臺灣未來的發展。¹⁵可見領臺之前，日本人早已悄悄登島，實地踏查、蒐集、記錄臺灣，以擘畫將來佔領此土地的統治藍圖。在不斷茁壯的日本帝國眼裡，臺灣早已是其開疆闢土、勢在必得的豐饒邊境。

（一）領臺前與初期的臺灣想像——以志賀重昂的書寫為例

「臺灣」這個地理名詞，讓日本人產生震撼性的深刻印象，正是 1874 年的「征臺之役」（即「牡丹社事件」）。此戰役，促使明治啟蒙期日本知識份子開始對臺灣島的住民及風俗產生一些想像的空間，例如集地理學家、政治家及教育家於一身的志賀重昂（1863-1927），1884 年札幌農業學校畢業後，曾於 1886 年搭乘海軍軍艦筑波號視察大洋洲各地 10 個月，隔年（1887）即將親身經歷寫成《南洋時事》。他在 1889 年增訂版《南洋時事》的「附錄」〈第六章：臺灣論〉，遙想 15 年前征臺之役，在遙遠臺灣島上蠻荒戰場的情景：

想ひ見る檳榔樹葉婆娑たる邊，披髮赤腳の生番が聲を揚げ木槍を揮ひて幾群の野豬を追逐し……髑髏を碎きて生血を啜り……。¹⁶

（中譯：想像那檳榔樹葉茂密的邊境，生番們披散著頭髮，赤腳奔跑，聲音沸騰，揮舞木槍，追逐野豬，……他們敲碎人骨，生飲人血……。）

透過文字的書寫，志賀重昂再現十九世紀晚期南臺灣檳榔樹林中，食人族披頭散髮，奔騰獵捕野獸，以及與日兵對壘激戰的驚悚場面。〈臺灣論〉中，志賀從自然地理的分布形勢之延伸，遐想臺灣乃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他說：

想ふに我が鎮西の地脈奔りて薩摩に止り，折れて近洋に入り，琉球群島を經，忽ち臺灣に到りて崛起したるものなり。眞個に臺灣の地勢い宛然我が版圖中に在り。¹⁷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4&id=815>（瀏覽日期：2016 年 1 月 25 日）。

¹⁴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年，頁 41-43。

¹⁵ 同上註，頁 43。

¹⁶ 志賀重昂，〈第六章：臺灣論〉，《南洋時事》「附錄」，東京，丸善商社書店，1889 年，頁 63，增補第 3 版（1887 年初版）。引自「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南洋時事網站：<http://school.nijl.ac.jp/kindai/HRSK/HRSK-00047.html#156>（瀏覽日期：2015 年 10 月 4 日）。

¹⁷ 同上註，頁 82。

(中譯：想像我國極西的地脈連接到薩摩島為止，轉折後進入海洋，經過琉球群島，不久就抵達突起的臺灣島。臺灣的地理形勢真得宛如是存在我國的版圖中。)

日本文藝評論家前田愛(1931-1987)指出，志賀的〈臺灣論〉是「援用自然環境，作為侵略主義及土地併吞主義的理論根據，亦即是一種地理政治學(Geopolitics)」。¹⁸人文地理學家米地文夫(1934-)則批判志賀另一名著《日本風景論》，是將「民衆的生活感覺、鄉土情感以及愛國精神(パトリオティズム)，和風景之美加以連結，並企圖與自然科學的座標軸組構成國土領域擴張基調的風景論。」¹⁹

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堪稱是明治維新後，將日本風景與愛國主義緊密結合的典範之作。(圖 2)他巧妙地運用科學地理知識、日本古典文學及現代風景觀，傳達出身為日本啟蒙時期知識菁英積極地融合西方現代與日本傳統文化，以創造隱含國族想像的「國粹主義」思想。²⁰《日本風景論》於 1894 年 10 月 27 日付梓，時值日清戰爭期，在愛國風潮急遽攀升的社會氛圍下，此書短短兩、三個月即刷印四版。²¹1895 年日本取得臺灣新領地後，《日本風景論》增訂版〈附錄〉，新添「臺灣の風景」一章，文中志賀以文人、藝術家、風雅的高士為觀覽對象，說：

火山岩の磊落峭拔して洋水の怒激浸蝕する処、宛として日本版図の内の地。……風景絶美にして、しかも規模は絶大、日本の高士この好資料地を新に獲、發憤せざらんとするも豈に竟に得んや。²²

(中譯：(臺灣)火山岩險峻雄偉，滔天海浪侵蝕岸邊，與日本版圖內的地理特質相似。……絕美的風景，規模宏大，日本的高士對此新獲得的領土，豈能不發憤並從中得到啟發呢！)

米地文夫針對志賀在增訂版〈臺灣の風景〉之論述，批判他：

¹⁸ 前田愛，〈志賀重昂と日露戦争〉，《幻景の明治》，朝日新聞社，1978 年，頁 253；引自米地文夫，〈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キマイラ的性格とその景觀認識〉，《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報》第 56 卷第 1 號，1996 年 10 月，頁 21。

¹⁹ 米地文夫，〈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キマイラ的性格とその景觀認識〉，《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報》第 56 卷第 1 號，1996 年 10 月，頁 21。

²⁰ 米地文夫將志賀重昂在《日本風景論》中的論述，解析為宛如將「獅子的頭=科學的偽裝」，「牡山羊的胴體=古典的詩歌美文」，「龍的尾巴=登山的提倡」，以及「山羊的口裡吐出火焰=國粹主義及反清國的檄文」的希臘神話怪物「喀邁拉」(キマイラ)。(同註 19，頁 16-17。)

²¹ 增野恵子，〈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挿図に関する報告〉，《非文字資料から人類文化へ—研究参画者論文集—》，神奈川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研究推進會議，2008 年，頁 102。

²² 同註 19，頁 23。

煽動領土擴大的構想；戰後慾望實現了，傲慢也跟著膨脹，並且推薦日本高士將新領土的題材，以詩歌、文章、繪畫的形式向世人誇耀。²³

如上所述，志賀重昂是明治時期的啟蒙知識份子，同時也是國粹主義的提倡者。無論在《南洋時事》或《日本風景論》的書寫策略，他都將日本或日本風景安置在本文中，而臺灣或臺灣風景則刻意編排在次要的〈附錄〉裡。這樣的書寫次序強烈地反映出撰寫者內心中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意識，以及國土中心與領地邊緣的地理隸屬觀。志賀引用現代科學的地理知識，表述「鎮西」之南的臺灣，無論從地理形勢或火山岩構成的地理特質來看，無庸置疑是隸屬日本的邊境土地。

志賀在書寫《日本風景論》時，經常運用比較手法以突顯論述的意圖。首先他提綱契領地分析日本風景之美，包括「瀟灑」、「美」及「跌宕」三種型態。依據他的詮釋，這三種特殊日本美的生成，主要有四個因素：一、多變的氣候與海流，二、大量的水蒸氣，三、火山岩地形居多，四、侵蝕激烈的流水。其中，他對第三項火山岩的論述最多，並強調日本風景之美主因就是火山，進而對比出沒有火山的朝鮮、中國的風景缺乏變化。他甚至將比較的對象擴大到沒有火山的英國及歐洲列強諸國，主張日本風景之美優於世界上其他國家。²⁴志賀在此展露出一種書寫企圖，即藉由日本自然風景之美以抵消日本人對歐美文化的自卑感。正如他高倡國粹主義，冀望透過物質及心理的雙重面向著手，以建構日本國族優越性的想像空間。

在《日本風景論》中，志賀將納入日本版圖臺灣的火山岩地理景色，描述如下：

火山岩の磊落峭拔して洋水の怒激浸蝕する処，宛として日本版図の内の地。

火山岩目を衝くの山、胸を盪すの洋海、豈に不朽の文、不朽の詩、不朽の画、不朽の刻作、此間に発せざらん哉。²⁵

（中譯：火山岩險峻雄偉，滔天海浪侵蝕沿岸，與日本版圖內的地理特質相似。迎面而來的山岳，胸中迴盪的海洋，豈不是能發展出不朽的文章、不朽的詩、不朽的畫，以及不朽的雕刻嗎？）

顯見，明治維新菁英領袖志賀重昂在日人治臺之前與初期，即從宗主國立場出發，分析氣候風土不同的臺灣之火山岩特質，將臺灣與日本的風景美作局部疊合。他

²³ 同註 19，頁 23。

²⁴ 同註 21，頁 103。

²⁵ 原文引自增野惠子，〈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挿図に関する報告〉，《非文字資料から人類文化へ—研究参画者論文集—》，神奈川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研究推進會議，2008 年，頁 106。

又運用附帶的敘述手法，將臺灣書寫進日本的風景知識體系中，以突顯臺灣作為日本殖民邊境的主從關係。

(二) 領臺初期日本菁英的臺灣認知與統治論

十九世紀末期面對已納入日本版圖的新領地臺灣，對不曾有過殖民統治經驗的日本政府來說，究竟應該採取何種統治方針，對當時的日本朝野可說是具有爭論性的議題。以下嘗試以福澤諭吉、原敬、伊澤修二及後藤新平等人，討論有關臺灣統治的文本，回溯十九世紀末期日本意見領袖對臺灣的想像、認知與統治理念；並探索不同領域者的臺灣論述對建構臺灣知識產生的實質影響。

1. 福澤諭吉臺灣「蠻民」論

福澤諭吉（1834-1901），日本大分縣人，明治時期啟蒙思想家與教育家。福澤早年跟隨緒方洪庵（1810-1863）學習荷蘭語和醫學，之後曾三度遊學歐美。返國後，他高倡「文明開化」論，並鼓吹自由民權及個人獨立精神。福澤於1875年撰寫《文明論概略》，1876年完成《勸學篇》，這兩本巨著對日本近代思想發揮極大的啟蒙作用。1882年他在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經常發表「不偏不黨的論點」評論時代的趨勢。²⁶從1894年12月至1898年5月，他藉由該報社論針對臺灣發表一系列看法。²⁷而這些帶有強烈殖民演化論色彩的論述，與福澤終身所鼓吹的現代啟蒙思想卻是相互抵觸，並展現出他對日本成為東洋霸主的帝國虛榮心態。²⁸

福澤諭吉在1894年12月5日《時事新報》社論中談到：「略取臺灣」是為了「邊境沖繩的安全，要根除支那人的野心……是戒備邊境的正當防衛手段」，²⁹同時也為了取得「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之地，「使內外人士安居樂業，……使日本國民年年歲歲多得利益」。³⁰從福澤的辯解即可看出，日本以防衛「邊境沖

²⁶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67-268。

²⁷ 楊素霞認為《時事新報》社論從1892年以來，常由福澤諭吉弟子石河幹明（1859-1943）代筆，因而她主張《時事新報》社論，不應視為福澤本人的言論。（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27。）但筆者認為，福澤諭吉創立《時事新報》，該報主筆雖為其弟子石河幹明，但實際上石河僅是福澤論述理念的文字化執行者，因此，《時事新報》社論依舊可以視為福澤諭吉思想的載體。

²⁸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頁50-51、69。

²⁹ 福澤諭吉，〈臺灣割讓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時事新報》1894年12月5日，社論，引自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一）〉，《臺灣風物》第41卷第1期，1991年3月，頁88。

³⁰ 同上註，頁91。

繩」作為發動甲午戰爭的藉口，但其真正目的則是想「略取臺灣」富饒之地，以擴張帝國並攫取殖民利益。可見福澤與志賀重昂等明治菁英領袖一樣，早已把臺灣視為與琉球群島連貫一氣的日本防衛線，是日本不可缺的邊境版圖。而掠奪「氣候溫暖、物產豐富」的臺灣，「日本國民」得以在此「安居樂業」，將可謀求海外殖民的長久福利。

至於該如何統治臺灣？如何處置臺灣人？福澤諭吉也提出看法。1895年6月7日臺灣總督府進駐臺北城施政後，《時事新報》於同年8月11日社論中建議：綜觀古今中外的實例，文明國領有未開化的蠻地，……處分方法有二。放任既有的土人，一概不過問他們的風俗習慣，……只謀求從土地所產生出來的利益，……如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相反地，完全摒棄土人，所有農工商事業皆交到文明人手中經營，徹底地把土地文明化。正如北美共和國與加拿大般，……其處分方法為倣效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拓美洲大陸的做法，把無知蒙昧的蠻民逐出境外，殖產上一切的權力全部由日本人掌握，斷然使全土地日本化。³¹

從前後文義來看，福澤諭吉顯然以「文明國」人自居，主張日本應倣效英國殖民北美洲的作法，將「未開化的」臺灣人當作「無知蒙昧的蠻民」，將其「逐出境外」。完全由日本人掌控本島的「殖產」事業，實施全面「日本化」的殖民政策。

不過根據馬關條約第5條的規定，從1895年5月8日條約簽定之日起，兩年內臺灣人有權選擇離臺或留臺，「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帝國的臣民」。³²在「國籍選擇」截止之前，福澤諭吉強勢主張將「蒙昧」島民驅逐出境，甚至有「殲滅醜類」之說。³³但1897年5月8日「國籍選擇」截止後，選擇返回中國者僅有4,400人，還不及臺灣總人口數的1%。³⁴由於「未遷徙者」應被視為日本臣民，因而福澤諭吉稍微調整其臺灣統治論點，並將關切焦點轉移到「殖產興業、教育、警察、衛生及土木」等多角化的經營上。³⁵1897年5月27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社論中說：

³¹ 譯文引自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28-129。

³²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東京，原書房，1965年，頁166。

³³ 福澤諭吉，〈臺灣騷動〉，《時事新報》，1896年1月8日，社論，引自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二）〉，《臺灣風物》第41卷第2期，1991年6月，頁77。

³⁴ 引自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39。

³⁵ 《時事新報》，1897年5月4日，社論，引自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39。

這土地成為日本的版圖是不爭的事實，但居民完全像外國人一樣，且絕不能承認他們為內地人。因為，他們……連風俗習慣、思想信仰都跟外國人沒兩樣。因此要統治他們，必須要有如面對外國人之覺悟才行。³⁶

同年9月，福澤諭吉對統治「像外國人」般的臺灣人，再度提出個人獨特的統治論，他說：

有人針對施政方針提出了應該盡可能以懷柔為旨趣，維持並切忌觸碰他們的舊俗，使島民打從心底順服於我的看法。亦是，只放重心在恩惠一方，另一方則欠缺威嚇。可是單單施行恩惠的話，只會讓他們更加乖戾不羈，這並非統馭島民的方法。……臺灣對我國而言，情況很特殊。在謀取土地利益的同時，對外有必要維持領土的安全，這點跟內地是沒有差別的。……這正是吾輩主張恩威並行的原因，事實上只要掌握到輕重緩急的要訣，找到能勝任全責的當局者，把一切的事情交給他處理即可。³⁷

如果將福澤諭吉1897年5月及9月的臺灣統治論，與「國籍選擇」截止之前的論述相對照，顯然地他也作了些調整。在1897年5月8日之前，他認知臺灣人是未開化的「蠻民」、「醜類」最好能「逐出境外」，甚至「殲滅」殆盡，以排除帝國移民、殖產的障礙。但1897年5月8日之後，「未遷徙」的臺灣人，依法已成為「日本帝國臣民」，福澤雖然仍視臺灣人為「乖戾不羈」的「島民」，但為了謀取殖民利益與防衛邊境領土，他也只能建議殖民施政應採「恩威並行」方針，並呼籲帝國中央賦與殖民地總督全權處理的重責。（圖3）

2. 原敬臺灣「內地延長」統治論

原敬（1856-1921），日本岩手縣人，明治、大正時期政治家。原敬乃記者出身，曾任外交官並出任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1900年參與立憲政友會（簡稱「政友會」）之創會，「政友會」執政期間曾任遞相與內相，並於1914年成為「政友會」總裁。1918年「米騷亂事件」發生後，寺內正毅（1852-1919）內閣總辭，改由原敬接任組閣。原敬內閣成立後，為削弱官僚與軍閥的勢力，著手進行各種制度的改革，並將殖民地武官總督改為文官派任。由於原敬並非貴族出身，又一

³⁶ 《時事新報》，1897年5月27日，社論，引自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41。

³⁷ 《時事新報》，1897年9月5日，社論，引自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43。

再推辭加封爵位，因而素有「平民宰相」美稱。³⁸

1896年1月，時任臺灣事務局委員的原敬，向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遞交〈臺灣問題二案〉意見書。他建議：甲、將臺灣視為殖民地，亦即「Colony」之類；乙、視臺灣為與內地稍有不同，但不當作殖民地。³⁹原敬認為不應將臺灣列為殖民地的理由如下：

首要在於臺灣地形接近內地，尤其海底電信不久之後將有二線開通。船舶航運亦逐漸頻繁。因此人民往來便捷將無異於內地。恰如德意志之亞爾薩斯-洛林，法國之阿爾及利。況且其人民與歐洲諸國統治異人種之情狀大有不同。⁴⁰

原敬所列舉，包括：地理接近、交通頻繁、交流便捷，以及人種相近等，乃是形成統一之國的要件。換言之，他認為臺灣就像德意志的亞爾薩斯-洛林，或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一樣，同屬於日本帝國的一個省份，而非「殖民地」。原敬早在出任首相之前，即對治理臺灣的策略採取與福澤諭吉截然不同的觀點。福澤主張仿倣英國殖民北美洲，將臺灣視為未開化的「殖民地」，唯有日本人掌控一切，才能「日本化」（同化）臺灣。原敬則認為臺灣人並非「異人種」，並具有一統之國的要素，實宜採用與內地制度趨近並邁向無差別的統治方針。福澤與原氏兩人的看法，相當程度代表的是領臺初期日本人「漸化」與「急治」臺灣的兩派主張。⁴¹

3. 伊澤修二「國語同化」與「技藝」論

伊澤修二（1851-1917），長野縣人，是日本近代知名的教育家。幼年時跟隨外祖父習字讀書，十五、六歲時入藩學「進德館」研習漢學與和洋之學。⁴²1870年伊澤以貢進生身分入「大學南校」就讀，攝取大量近代西方教育的理論。畢業後，伊澤出任愛知師範的首任校長。⁴³1875年8月文部省派遣他赴美，入麻薩

³⁸ 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50-151。

³⁹ 薛化元編輯，《近代化與殖民》，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83。

⁴⁰ 原敬，〈臺灣問題二案〉，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台灣資料》，臺北，秘書類纂刊行會，1936年，頁32-34。

⁴¹ 領臺之初，松方正義首相時代的法制局文書記載，當局一方面主張臺灣與英、法的印度、東京（灣）不同，比較接近德、俄的亞爾薩斯-洛林、波蘭，另一方面又從財政困難及風俗習慣不易改變的認識為起點，認為「急治」不可行，必須採「漸化」的同化政策。（參見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經典研讀會譯，《「日本人」的國境界》，嘉義縣民雄鄉，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頁137。）

⁴² 楊孟哲，《日治時代臺灣美術教育（一八九五～一九二七）》，臺北市，前衛，1999年，頁27-28；尹健次，〈明治前期國民形成論の展開—伊澤修二の教育思想にみるその一研究—〉，《教育学研究》第49卷第2號，1982年6月，頁195-196。

⁴³ 尹健次，〈明治前期國民形成論の展開—伊澤修二の教育思想にみるその一研究—〉，《教育学

諸塞州普林吉瓦特（Bridgewater）師範學校攻讀教育學與心理學。1878 年返日後，伊澤出任東京師範學校校長，致力於日本師範教育的改革。⁴⁴ 1890 年他創立「國家教育社」，主張推動國家主義教育政策，以鼓吹忠君愛國的思想。1895 年 2 月，伊澤向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毛遂自薦，希望來臺推行「國語」（日語）教育以「同化」臺灣人。同年 5 月，伊澤修二受聘為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6 月來臺後，先在大稻埕開設學務部，之後設立「國語傳習所」，主張日本人也必須學習臺語。1897 年 7 月，伊澤因教育經費問題離職。雖然任期不到兩年，但他的教育理念卻影響日後臺灣總督府教育政策的發展方向。⁴⁵

伊澤修二從 1895 年 2 月首度發表對臺灣教育的意見書，一直到 1911 年為止，還陸續發表過〈臺灣教育談〉、〈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例會演〉、〈台灣公学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新版図人民教化の方針〉及〈我國體を論じて大日本國家教團設立の精神に及び〉等攸關臺灣教育議題的文章。從其臺灣教育論述中，可以看出伊澤修二亦是明治近代化菁英的代表類型，而他對臺灣的認知與對殖民教育理念的構想，對後繼殖民政府的臺灣知識建構亦產生一定影響力。

1895 年 5 月 25 日，伊澤修二赴臺之前，先在《廣島新聞》發表〈臺灣教育談〉，闡述他對新領土的教育抱負。文章中，他從帝國的角度出發，批評臺灣人「教育水準低劣」，有如沈淪於「動物的境界」；但幸而投入帝國，天皇賜予恩惠並憐憫之，故臺灣「蠻民」若能接受近代「文明教育」，日後將享有「高等人生的幸福」。⁴⁶

依他的構想：

偉なる哉我が聖天子の御稜威は八紘に光被し五百万の蛮族も將に天日を拝するの時近きにあらんとするなり。……先づ第一に日本語を輸入し繁雜なる漢文字に代ふるに片假名を以てし成る丈早く言語の通ずる事に力を尽し而して後漸次彼等の脳裡の開拓に取り懸るの外なし。⁴⁷

（中譯：偉大、神聖的天皇其威嚴光耀宇宙，五百萬蠻民也即將對著如太陽般的天皇頂禮膜拜。……第一要務是要輸入日本語，取代繁複雜亂的漢文字，盡心盡力地使片假名能早日成為溝通的語言，並逐漸掌控所有蠻民心靈的發

研究》第 49 卷第 2 號，1982 年 6 月，頁 196。

⁴⁴ 同上註，頁 197。

⁴⁵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120-122。

⁴⁶ 伊澤修二，〈臺灣教育談〉，《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年，頁 570。

⁴⁷ 同上註。

展。)

文中透露出尚未履新之前，伊澤一如福澤諭吉，樣板性地認定臺灣人是「教育水準低劣」的「蠻民」，使用的「漢文字」「繁複雜亂」，必待天皇恩賜「文明教育」後，方能享有「高等人生的幸福」。伊澤通篇文章以「文明者」自居，自詡將以皇恩教化臺灣「五百萬蠻民」。此文，十足地表露出伊澤修二立足於帝國殖民者的倨傲心態。

1896年2月11日，伊澤修二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進行〈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例會演說〉，提出以「將臺灣看成是日本身體的一部分」治理的概念，⁴⁸他說：

本來新領土就是我國君主的領土。要將此地人民日本化時，除了教育之外別無他途。……我們身體中不管皮膚、肉、一片骨頭、一滴血是從何而來？是我皇祖皇室在數千年以前，在父祖的時候從帝室的恩澤而得來的血，得來的肉。把如此之物奉獻給我們君主，誠是一件令人感激的事，我認為這種犧牲、奉獻不但不是可惜的事，而且實在是一件至為光榮名譽之舉。⁴⁹

在此，伊澤修二以日本人的身體從皮膚、血肉到骨頭，都是從「帝室的恩澤而得來的」的單一民族血緣概念，乃承繼幕末至明治初期「水戶學」後期學者和吉田松陰（1830-1859）等人的「國體論」思想。⁵⁰演說中伊澤強調，天皇承繼天照大神的血統，而效忠於天皇的日本人民遠赴「新領土」從事教化「蠻民」的「犧牲」與「奉獻」，則是「忠君愛國」⁵¹的光榮表現。

1897年5月20日伊澤修二在「帝國教育會」發表〈台灣公學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臺灣公學校設置的相關意見）演說，闡述他在新領地創設公學校的宗旨：

皇室是用一視同仁之精神來看待世界各國人民之故，任何人只要服從天皇，

⁴⁸ 伊澤修二，〈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例會演〉，《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年，頁595。

⁴⁹ 同上註。

⁵⁰ 依據張惟綜對近代日本「國體論」思想的形成與演變之分析，國體論者皆依據日本神話來說明天皇與日本國土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日本近代「國體論」，濫觴於幕末水戶藩學者所重新構築的「神國思想」而形成所謂的日本「國體論」。他們提出「天孫降臨」的神話，認為日本皇統與天地長存，而天照大神則以忠與孝「建人紀，垂訓萬世」。後期「水戶學」學者融合了歷史神話、儒學、神道三種思想要素，構築國體理論，並以國防（攘夷）為起點，進而轉入日本神國（尊王）的意識形態。（張惟綜，〈日本國體論—從幕末至明治—〉，《育達科大學報》第28期，2011年9月，頁80、82、84、86、97。）

⁵¹ 伊澤修二在1890年擔任文部省編輯局長時創立了「國家教育社」，該社的宗旨為「表明國家教育的真諦，展現忠君愛國的精神」。他在〈國家教育社設立ノ要旨〉一文中，則強調「寶祚無窮」與「國體尊嚴」，表現出對天皇制國家主義思想的擁護。（尹健次，〈明治前期國民形成論の展開—伊澤修二の教育思想にみるその一研究—〉，《教育学研究》第49卷第2號，1982年6月，頁202。）

就是其臣民。我《教育敕語》在創造時就是以不論拿到何處，都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精神來纂寫的。……將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國語教給臺灣人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新領土中的母親們所講的都是外人的語言，所以到臺灣教導國語即是在從事母親的任務。⁵²

伊澤於同年 1 月 18 日，曾將漢譯《教育敕語》奉召入臺，作為同化教育的最高指導方針。而為了將立基於「單一民族神話」為想像基礎的《教育敕語》，⁵³與統治異民族的臺灣之間的矛盾消弭，他強調講「外人語言」的臺灣人，在皇室「一視同仁」精神的感召下，只要一心「服從天皇」，都能成為天皇的「臣民」。此論點，基本上和他的國家主義教育理論所追求「發揮忠君愛國之精神」、「養成臣民之品性」⁵⁴，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他視臺灣人為「外人」，故必須設置公學校以「教導國語」，而唯有運用作為後天「母親」的「國語」，灌輸新附民有關「忠君愛國」及「臣民品性」的思想，才能達到「同化」異民族為日本人的教育宗旨。

1898 年已去職離開臺灣的伊澤，發表〈新版圖人民教化の方針〉（新版圖人民教化之方針），強調臺灣在地理上與日本一脈相連，在歷史上因日本甲螺（倭寇「頭目」或 Captain）、鄭成功（母親是日本人）佔據過臺灣，屬同文同種，而且「智德之量」也和日本人幾乎相同，因而他主張教化臺灣人應採「混和主義」方針，尊重當地居民的語言，「彼我相學」，藉由融合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文化，以達到教化新版圖人民的目標。⁵⁵語言教育主張「混和主義」，顯然與 1895 年尚未抵臺前，誇言要以「日本語取代繁複雜亂的漢文字」，已作了相當程度的修正。

1911 年，伊澤發表〈我國體を論じて大日本國家教團設立の精神に及び〉（試論我國體及大日本國家教團設立之精神）一文，論述臺灣人歷經「同化」為日本「國民」後，從「一視同仁」的「國體」精神來看，就不應該受到「排斥」。他說：

在明治期有許多外國人民加入我國臣籍，其首先就是臺灣人……本來我國國

⁵² 伊澤修二，〈台灣公學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收入《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年，頁 615-616；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139。

⁵³ 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56。

⁵⁴ 伊澤修二〈本大臣に提出意見〉，收入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 年，頁 142。

⁵⁵ 伊澤修二，〈新版圖人民教化の方針〉，《教育報知》第 579 號，1898 年 8 月，收入《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年，頁 637-639。

體就是絕對不排斥外國人的，歷代天皇愛護這些遠來人民，如有技藝，能貢獻國家社會者就讓其入我臣籍。換言之同化成我國民後，其就變成我同胞。⁵⁶文中他再度強調，接受「同化」為「有技藝」的臺灣人，將可成為血緣相連的「同胞」，即能突破國體論「單一民族神話」與「家族制國家觀」，以及統治殖民地外族臺灣人的矛盾。⁵⁷此處所謂「技藝」，則是指接受現代化文明薰陶的實用知識。早在 1896 年 6 月伊澤修二擔任臺灣學務部長時，即依據府令第 15 號發布《國語傳習所規則》第 13 條，宣示：

本所雖然是以傳習國語為主旨，但也經常注意道德的教訓和智能的啟發。道德的教訓是以尊皇室、愛國家、重人倫以培養本國精神為趣旨。而智能的啟發則是以教育臺灣人經世立業所須之知識技能為主。⁵⁸

可見伊澤在推動國語同化教育的過程中，除了語文、精神的同化之外，他對教授「知識技能」以啟發臺灣人「經世立業」的實用「技藝」，亦納入其所擘畫的教育藍圖中。

根據蔡錦堂的調查分析，1896 年 11 月發行的《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冊，全書共計 17 課，除了第 3、4、5 課「本國之旅」介紹日本地理之外，其他課文多以博物、自然、理科、天文現象的現代化教材為主。蔡氏因而認為，這本殖民時期最早刊印的教科書，涉及「日本化」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之題材內容，所佔的比例並不高。⁵⁹而陳培豐也分析《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的內容，認為明顯偏向「智育」，展現「同化於文明」多過「同化於民族」。⁶⁰因此，在「伊澤主導下的國語『同化』政策中包含了大量的近代化要素」，⁶¹而這正是殖民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包括藝術家，普遍能接納日本現代殖民教育的關鍵因素。（圖 4）

4. 後藤新平「生物學」統治論

⁵⁶ 伊澤修二，〈我國體を論じて大日本國家教團設立の精神に及び〉，《樂石叢誌》第 8 卷，1912 年 2 月，頁 3。

⁵⁷ 撰寫《敕語衍義》的井上哲次郎，主張日本的「國家」是「家族制」的形構。他在《國民道德概論》中闡述「家族制國家觀」是有機體的國家論，是以「擬制血緣關係」為基軸所構築的國家觀。（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62。）

⁵⁸ 臺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71。

⁵⁹ 蔡錦堂，〈日本據臺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收入鄭樑生主編，《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水，淡江大學歷史學系，1993 年，頁 241-244。

⁶⁰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147。

⁶¹ 同上註，頁 120。

伊澤修二持積極而肯定的態度，一心想以「一視同仁」的「國體論」，與奠基於智育(文明)的基礎教育，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的「國民」、天皇的「臣民」。但 1898 年至 1906 年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857-1929)則認為對「民度」(社會進化程度)不同的人施予和內地同樣的統治政策是愚蠢之舉。⁶²他揶揄在臺灣施行「內地延長主義」式的同化政策(法律與政治權利上的同化)是不切實際的。⁶³後藤不僅反對「法制的同化」，對於「文化的同化」亦抱持消極的態度。他是一位理性的現實主義者，曾說「政治之要在善乘人之弱點」，因此殖民政策就是要了解「土民」的習慣，找出他們的弱點，使他們歸順於皇德。⁶⁴

日人領臺後，由於本身並無任何殖民統治經驗，又缺乏可資參考的政策與法令，加上臺人強力反抗及風土疾病的侵襲，故自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到第三任乃木希典(1849-1912)，臺灣的經營堪稱窒礙難行。此情形一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就任，他延攬後藤新平來臺輔佐他，之後殖民統治才產生重大轉變。與原敬同樣來自岩手縣的後藤新平，早年畢業自福島縣醫學校，並在德國苦讀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時，在「政治生物學原則首重調查」的方針下，開始投注大量經費與人力，展開臺灣土地(1898-1904)、人口(1905 年開始，之後每隔 5 年一次)、林野(1910-1925)及舊慣(1901-1919)等調查事業。⁶⁵歷時多年的調查研究，不但使殖民政府獲得掌控臺灣人口動態與林野資源的情資；而釐清土地、林地的所有權則有利於總督府的徵稅，促使臺灣產業得以充分開發及資本主義化。而被後藤譬喻為「新領土統治基礎工程」的舊慣調查，則是他政治生物學原則的「最終結論」。⁶⁶後藤曾說新領土臺灣與日本在制度、慣習上具有差異性，故必須尊重臺灣的舊慣。⁶⁷然而溝部英章則批評後藤新平的「尊重舊慣」說，認為後藤並非基於對臺灣文化傳統的尊重，而是基於有利

⁶² 後藤新平，〈最近植民政策〉，《同志社時報》第 115 號，1914 年，頁 2、3；引自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6。

⁶³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 年，頁 46、51；引自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6。

⁶⁴ 後藤新平，〈臺灣の統治〉，收入立石駒吉編，〈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1911 年，頁 164；引自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7。

⁶⁵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市，博揚文化，2005 年，頁 12、15。

⁶⁶ 同上註，頁 13。

⁶⁷ 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5。

於統治的功利心態。⁶⁸但不可諱言，臺灣總督府在各式調查機制下所建構起來的臺灣知識，不但成為殖民統治政策擬定的重要參考依據，同時也記錄下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的演變歷史。

三、舊慣調查對臺灣知識建構的影響

如上所述，領臺之前或初期，日本明治維新菁英的臺灣論述，或基於帝國統治利益，或從國家主義色彩濃烈的「國體論」出發，來看待新領地臺灣。他們對臺灣的認知，大都侷限於臺灣是日本重要的邊境，是帝國不可分割的屬地。至於要如何統治這塊住著 500 萬「蠻民」、「外人」的殖民地，他們的態度往往模稜兩可。到底該採用激進的同化政策？或緩和的同化政策？也是搖擺不定。直至「兒玉・後藤體制」形成，並於 1901 年展開全面性舊慣調查事業後，才奠定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礎石。換言之，透過舊慣調查的文獻資料收集與系統化的分析研究後，殖民政府方建構起臺灣知識的寶庫，而臺灣不再只是殖民者模糊的、想像的帝國邊境，而是可分析、可研究、可支配的南國邊地。

早在 1901 年之前，來臺日人即有個人人類學的踏查研究，⁶⁹以及同好組織性的慣習研究會。回溯日治初期官民的踏查訪問，與 1901 年後的全面性舊慣調查，將可釐清殖民時期日本人如何進行臺灣族群、固有慣習與民風習俗的調查研究，以及其依此所建構的臺灣知識之實質內容。而臺灣知識的現代化建置，對 1927 年前日本人及臺灣人在定義和推展臺灣固有傳統文藝時，究竟產生那些漣漪效應呢？

（一）舊慣與統治關係的觀察期

日本人自詡以「文明」者之姿入主臺灣，將對「蒙昧」的「蠻民」進行「日本化」統治。實際踏上新領地後，殖民統治者及知識份子隨即發現，島民無論在族群、語言、文化或風俗習慣上，都和內地人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治理上問題重重。為了制訂統治方針，首要工作非得進行詳盡的人類學、法治及慣習踏查工作不可。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7-1925）對伊澤修二立基於教育觀點之言：「教育若要能徹底地醇化人心，則必須進入各種社會，深察其人情風俗，制訂足以適應

⁶⁸ 溝部英章，〈後藤新平論—鬭争の世界像と「理性の独裁」—1〉，《法学論叢》第 100 卷第 2 號，1976 年 11 月，頁 81；引自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5。

⁶⁹ 按日治初期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人個人型態的人類學踏查研究，因屬人類學專門學科領域，故本文並未將其納入討論。

的教育法」，⁷⁰頗有同感。因而他認為伊澤是倡導臺灣舊慣調查的嚆矢。⁷¹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1850-1900）也說：「繼戰亂之後，欲維持地方之和平寧靜，其施政方針應儘量簡單且依從舊慣為宜」。⁷²此外，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1848-1913）則主張：

內地之法律規則雖應努力漸次普及於本島，然人情風俗言語有別之故，欲撤去彼此差別，使之齊一於法律規則之下，此舉不但無法避免發生衝突，亦無法達到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職是之故，在地方行政進行之同時，需審查各地人情風俗言語之異同，就法律規則不適應部分，以律令或敕令規定除外，非兩相提攜，以達其目的不可。⁷³

可見，日人治臺初期，包括掌管教育的學務部長，主管各項政策的民政局長，乃至殖民地最高權力者臺灣總督，都體認到唯有考察臺灣的風俗、人情、言語及舊慣，方能擬定合適的殖民地統治政策與律法。

（二）初期慣習調查事業：「臨時調查掛」與「臺灣慣習研究會」

領臺初期，雖然殖民當局已認知到舊慣調查有助於帝國的統治；但因臺人頑強抵抗，日人又水土不服，故臺灣總督府僅於 1896 年 12 月，先在民政局參事官室設置「臨時調查掛」負責舊慣調查事宜。⁷⁴但這個「編制性」的調查機構，實際上並無主導全面性舊慣調查的實權地位。

1900 年 10 月，一群臺灣總督府、法院及各級地方官吏成立了「臺灣慣習研究會」，從事業餘的調查研究。⁷⁵該會會長與副會長，分別由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幹事長則由覆審法院院長鈴木宗言（1863-1927）擔任，調查內容偏向漢人的生活習慣與風俗，（圖 5）以備行政司法實務的稽考。⁷⁶1901

⁷⁰ 梅陰子（伊能嘉矩筆名），〈臺灣舊慣調查事業沿革資料(一)〉，《臺灣慣習記事》第 4 卷第 1 號，「雜錄」，明治 37 年（1904 年）1 月 23 日，頁 54。

⁷¹ 木母浮浪（伊能嘉矩筆名），〈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史〉，《臺灣時報》第 63 號，大正 3 年（1914 年）12 月 15 日，頁 3。

⁷² 水野遵，〈臺灣行政一斑〉，《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乙種永久，第 4 門，文書（報告・民政局），第 7 卷，明治 28 年（1895 年）9 月 18 日。

⁷³ 梅陰子，〈臺灣慣習調查事業沿革資料(三)〉，《臺灣慣習記事》第 4 卷第 3 號，明治 37 年（1904 年）3 月 23 日，「雜錄」，頁 42-43。

⁷⁴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9 年甲種永久，第 2 門，官規官職（處務規程），第 2 卷，「臨時調查掛設置ノ件」，明治 29（1896）年 12 月 17 日。

⁷⁵ 臺灣慣習研究會，〈發刊辭〉，《臺灣慣習記事》，第 1 卷第 1 號，1901 年 1 月，頁 2。

⁷⁶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市，博揚文化，2005 年，頁 326-334。

年 1 月 25 日該會創立機關刊物《臺灣慣習記事》，⁷⁷ 刊載會員的調查報告、討論議決、舊慣釋義，以及其他的民事、刑事的判例等；⁷⁸ 另外還闢有「雜錄」專欄，收錄臺灣各地民情風俗。（圖 6）⁷⁹

誠如《臺灣慣習記事》〈發刊辭〉開宗明義所言：

民俗習慣乃與國家社會，歷經沿革，與歷史俱進發達者。……法律非淵源於舊俗不可，政事非以人情為根基不能成。假設法律不以習俗為淵源，則法律將與習俗納鑿不相容，甚或破壞習慣，擾亂民俗。⁸⁰

〈發刊辭〉又舉英國佔領印度之例，說明先行「調查習俗」，「而後施政」，乃是「英國殖民政策成功」的主因。該刊勉勵日人，應以英國治理印度，尊重舊俗、習慣的統治策略，作為「經營新領土」的典範。⁸¹ 可見「臺灣慣習研究會」設立的目標，一開始就指向研究臺灣舊慣習俗，以作為殖民施政的參考基礎。

山根幸夫指出，此會的「會員大多為總督府和各級地方官廳官吏，……民間人士可能只佔一成」。因而嚴格來說，「臺灣慣習研究會」充其量只能「算是官方性質的研究團體，且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外圍團體」。⁸² 職是之故，該會於達成總督府調查事業「輔助補弼」的任務之後，⁸³ 即於 1907 年 8 月宣告解散。

（三）舊慣調查事業的展開與成果

1901 年 10 月 25 日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是殖民官方挹注大量資源與正式編制的專責機構。而正式啟動舊慣調查事業者，即是兒玉總督所重用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本身具有醫學背景，一再強調應以「生物學原則」來治理臺灣。他說：

社會習俗或制度，必有其長久以來存在之理由，如不明究理，一味地將文明國家之制度施行於未開化之地，此謂文明之虐政，余以為萬萬不可。故統治臺灣，首先得以科學方法調查當地之舊慣制度，採順應民情之措施。若未詳加調查，即將日本內地之法制施行於臺灣，無異是將比目魚的眼睛變為鯛的

⁷⁷ 臺灣慣習研究會，〈會報〉，《臺灣慣習記事》第 1 卷第 1 號，1901 年 1 月，頁 70。

⁷⁸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 1 卷第 1 號，1901 年 1 月，頁 4-42。

⁷⁹ 臺灣慣習研究會，〈雜錄〉，《臺灣慣習記事》第 1 卷第 1 號，1901 年 1 月，頁 43-64。

⁸⁰ 同註 75，頁 1。

⁸¹ 同註 75。

⁸² 山根幸夫，〈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の成果〉，收錄於山根幸夫，《論集近代中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 年，頁 115-116。

⁸³ 〈本會解散の辭〉，《臺灣慣習記事》第 7 卷第 8 號，1907 年 8 月，頁 1-3。

眼睛一般，是不解政治真義之行為。⁸⁴

後藤新平從理性現實主義的立場著眼，反對原敬將臺灣視為省，實施「法制的同化」；他也不認同伊澤修二採「一視同仁」準則，進行「文化的同化」。⁸⁵基本上，後藤主張臺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將「文明國家之制度」在「未開化」的臺灣貿然施行，反而是適得其反的「虐政」。他堅持採用「無方針」、「尊重舊慣」及「生物學」的統治原理，以落實消極的同化政策。⁸⁶後藤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並參考先進國家的殖民經驗，堅持唯有以調查為基礎的「政治生物學」，才能推動長治久安的殖民政權。他主張以全面的舊慣調查及專家的分析研究為基礎，以進行殖民地的行政改良、法制訂立和擬定整體的施政藍圖。⁸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於 1919 年 5 月，完成以臺灣漢族為主的舊慣調查及立法任務之後裁撤了。舊慣調查的終極目標是在制定適宜臺灣的民商法案，將殖民地調查結果化約成法典。雖然「舊慣立法」的目標最終並沒有達成，⁸⁸但三大調查成果的出版，包括《臺灣私法》（圖 7）、《清國行政法》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圖 8），卻成為當時與後世瞭解臺灣漢人經濟社會、清朝法制與原住民語言風俗的重要學術研究史料。⁸⁹

（四）殖民論述下的舊慣知識

臺灣舊慣調查與知識的生產，是藉由殖民國家力量的介入，將被殖民者加以記錄、分類、排序與報導。殖民學者專家引用歐陸現代知識理論，⁹⁰綜合、歸納、比較舊慣調查所得的基礎資料，作出體系性的分析與詮釋，以建立帝國主義色彩的殖民論述和文化霸權。後藤新平善用臺灣舊慣於殖民地治理，並於統治前期的過渡階段形成「舊慣政治」的理念。⁹¹他的「舊慣政治」是以「舊慣調查」為技

⁸⁴ 鶴見祐輔編，《後藤新平》第 2 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年，頁 398-399；譯文引自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9 年，頁 208-209。

⁸⁵ 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77。

⁸⁶ 同上註，頁 174-175。

⁸⁷ 鶴見祐輔編，《後藤新平》第 1 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年，頁 912-914。

⁸⁸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市，博揚文化，2005 年，頁 326-334。

⁸⁹ 同上註，頁 310-311。

⁹⁰ 例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法制）部長岡松參太郎，納入世紀歐洲盛行的比較法學基礎，以探討臺灣原住民與漢人的習俗。（岡松參太郎，〈緒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蕃族慣習研究》第 1 卷第 1 編「番族概況」，1918 年，頁 1-2。）

⁹¹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9 年，頁 210。

術，並以「舊慣立法」為終極的目標。⁹²從「舊慣」調查衍生為「舊慣」政策的統治理想，顯示殖民者已逐漸廓清早期視臺灣為蠻民之域、未開化之地的制式印象，並承認臺灣具有傳統固有的文化根柢。⁹³但「舊慣」一詞仍帶有強烈「文明啟蒙色彩」之意味，⁹⁴殖民宗主始終是立於「文明開化」的霸權角度，將臺灣傳統文化視為有待「教化」及「啟蒙」的次級位階。

四、舊慣調查所形塑的異國趣味與臺灣固有文化意象

從 1896 年 12 月「臨時調查掛」開始的舊慣調查事業，其凝視、記錄及分析的對象，乃是被殖民的臺灣漢人與原住民。而這一系列結合傳統漢學與現代知識所建構的臺灣慣習知識網絡，其建檔者與使用者，毫無疑問都是制定殖民統治政策的日本官員與學術研究者。被日本人視為「教化」、「啟蒙」對象的臺灣人，顯然無法、也無能運用殖民者所建構、詮釋的這套縝密之文化資本。

調查事業進行的初期階段，「臺灣慣習研究會」的成員，即開始依據歸納、分析的訪談調查資料，論述臺灣的文學、書畫藝術的發展特色。官學者也有人從帝國所建構的臺灣知識，認知到臺灣人因自然地理、氣候及族群的混雜多元，所產生與日本、中國存在差異性的文藝特質。而如何開發、製造新領地具有趣味性的特有文化資本，以貢獻於帝國文化領域的拓展事業，則是日本官員與學者所關切的議題。

（一）日本官學者從舊慣調查所衍生的臺灣文藝趣味

「臺灣慣習研究會」會員蘇來於 1905 年 8 月發表〈なるべし〉（應該如此才對）一文，指出「南清文學的趣味」與「原始文學……馬來人種的趣味」，是目前能夠掌握臺灣文學的「兩大要諦」。他強調臺灣文學若要在日本「文壇地方分權」中，穩居「天南一方」的霸主地位，就必須充分發揮這兩種趣味特點。⁹⁵在此，蘇來引用日本小說、評論家後藤宙外（1867-1938）「文壇地方分權」說，認

⁹² 同上註，頁 220-222

⁹³ 例如法學士佐藤謙太郎說：「臺灣……擁有特殊語言、宗教及風俗，其知識水準雖然發達，但與日本內地仍有差異。……不僅與我內地大異其趣，甚至與中國本土亦不可同日而語。此乃本島所以需要舊慣調查之理由。」（佐藤謙太郎，〈臺灣舊慣一斑〉，《臺灣慣習記事》第 1 卷第 2 號，「調查事項」，1901 年 2 月，頁 18-19。）

⁹⁴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統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頁 38。

⁹⁵ 蘇來，〈なるべし〉（應該如此才對），《臺灣慣習記事》第 5 卷第 9 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5 年 8 月，頁 63。

為臺灣所形成的地方文學圈，具有中國南方與原住民兩種混合趣味。臺灣與關東、關西、中國（以日本岡山為中心）、九州、北陸、四國、北海等「大日本」文學圈其他地方的文學圈並立，⁹⁶如能強化此獨特的趣味，就能分權獨立成為天南之霸主。

文中蘇來又談論到他對未來臺灣美術的冀望。他說：東京美術學校出身藝術家組成的「丹青會」，於日俄戰爭勝利的這一年（1905）來臺北舉行第9屆展覽。「丹青會」展的旨趣為：「闡發文化之華彩於中外，發揚不朽國光於世界，是身為國民的我們應盡的義務。而振興美術之事則是戰爭勝利後潤飾太平的要義」。蘇來寄望此會成員，能將「臺灣的風物採擷為繪畫的元素，可望在日本美術上開創一個新軌道」。⁹⁷身為「臺灣慣習研究會」成員的蘇來，對臺灣本地文學及風物具有基本的知識。而他的論述，不意外地亦是從「大日本」帝國的立場出發，呼籲在臺灣與內地來的日本文藝家，應該致力於開發臺灣特殊文學資本，讓以臺灣為名的文學能稱霸於南方，以造就「大日本式」的「地方」文學圈。文章結尾，他呼籲日本美術家，應以「美麗之島—フォルモサ」為創作元素，「親手作成」，創造出「足以驚動全世界」，並在「美術史上留下光輝的」的傳世巨作。⁹⁸換言之，充分開拓新領地的文學與美術，最終目的是要掌控、支配臺灣的文化資本，並將其轉化、收編為帝國所定義的「大日本」文化，製造出別具「趣味」性的殖民地臺灣文藝。

1905年10月，「臺灣慣習研究會」幹事，並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執掌法政、司法業務的小松吉久（1867-?），針對「殖民地文學」與「臺灣趣味」，也作了一番闡述與連結。他說：

近來殖民地文學（コロニアレーリテラツール）在德國漸漸受到注目……殖民地的風土、氣候、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其他很多地方，與本國有相異的趣味，因而文學上有足以發揮其特殊的風趣與光彩。……而所謂（臺灣）趣

⁹⁶ 蘇來於〈なるべし〉中，引用後藤宙外「文壇地方分權」理論，說：「畫出理想的文學勢力分佈圖一看，就會成立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文學圈；以京阪為中心的關西文學圈；以岡山為中心的中國文學圈；以熊本為中心的九州文學圈；以新潟為中心的北越文學圈；以仙臺為中心的東北文學圈；以金澤為中心的北陸文學圈；以出雲為中心的山陰文學圈；以高知或松山為中心的四國文學圈；以札幌為中心的北海文學圈；以臺北為中心的臺灣文學圈這種自然的區劃，各自發揮特長，相攻相磋，造出大日本式的大文學，以貢獻世界的文運。」（蘇來，〈なるべし〉（應該如此才對），《臺灣慣習記事》第5卷第9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5年8月，頁62。）

⁹⁷ 同註95。

⁹⁸ 同註95，頁64。

味，僅靠書籍文物或人際關係，還是不能徹底瞭解，無論如何，非得到殖民地實地去體會，否則難以得到真象。⁹⁹

小松批評日本內地人，多數不知殖民地臺灣的真相，乃「一大缺陷」。他呼籲想要「發揮臺灣趣味」的文學從事者，都應該到殖民地臺灣進行親身的體驗。¹⁰⁰他強調日本領臺十年，該邊境「已脫離昔日與猛獸決鬥的野蠻狀態」，正朝著「光輝的、生命的、趣味的清朝律例新天地邁進」，並宣稱「發揮臺灣趣味的殖民地文學時代正要來臨」。¹⁰¹

小松吉久，日本神奈川縣人，字孤松，幼年曾入私塾學習漢學。1896年4月渡臺，先後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法務部、總務部及秘書課等單位，1901年則轉任總督府監獄臺北監獄長，¹⁰²因而對領臺初期本島的法政、司法制度的推行頗有貢獻。¹⁰³1900年「臺灣慣習研究會」成立時，小松出任幹事，並為《臺灣慣習記事》撰文。1905年他對舊慣調查事業主事者之一，京都帝國大學法學教授織田萬（1868-1945）主筆的《清國行政法》第1卷付梓，相當引以為傲。故在行文中，讚譽重新建構的「清朝律例」，讓殖民地脫離野蠻，跨向「新天地」；而具有「臺灣趣味」的殖民地文學，亦將立基於此而發揚光大。

治臺初期，隨著舊慣調查的開展，臺灣在殖民官學界的調查、研究、詮釋與模造過程中，逐漸被形塑成具有與日本其他地區擁有不同律法、歷史、人文、風土特質及趣味的領地。根據初步舊慣調查的資料，臺灣被劃入「大日本」帝國不可分離的一個「地方」，並成為日本官學者想像、建構的「大日本」文化圈，位於異域南方並具有「特殊的風趣與光彩」的邊境屬地。

（二）伊能嘉矩的臺灣調查、書寫與展示

⁹⁹ 小松吉久，〈殖民地文學——臺灣趣味の發揮〉，《臺灣慣習記事》第5卷第10號，1905年10月，頁1-2。

¹⁰⁰ 同上註，頁4-5。

¹⁰¹ 同註99，頁5。

¹⁰² 漢珍數位圖書，「臺灣人物誌」網站

<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ervlet/ShowService?&path=ftimg/&title=10/1018202.pdf>。（瀏覽日期：2016年6月15日）

¹⁰³ 小松吉久曾於1907年任彰化廳長，1909年至1920年則出任宜蘭廳長長達11年。1920年轉入實業界發展，並於同年代任臺北州協議會員及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從小松早期渡臺吟詠基隆港之詩，至晚期參與「南雅詩社」詩作，可見其漢文詩學根柢甚深。他與在臺日人及臺籍文士，如：臺北帝大教授久保天隨、尾崎秀真、豬口安喜、神田喜一郎及魏德清等人交往甚密。（陳青松編撰，《基隆古典文學史》，基隆市，基隆文化局，2010年，頁53；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楊秀芳、蘇碩斌、黃美娥等人著，《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142-143。）

日治時期在漢人與原住民調查研究領域成績卓著的官學兩棲學者，如伊能嘉矩（1867-1925）與尾崎秀真（1874-1952），他們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文獻收集及文物蒐藏的現代方法學，建構起對臺灣歷史、文化的知識體系。兩人相繼將調查所得知識轉化後，運用於公共性的博覽會與博物館展示中，呈現出殖民時期「官學並行」學術傳統中，從文化政治的立場闡述、形塑他們所凝視的臺灣。伊能與尾崎除了投入漢人、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研究之外，對臺灣清朝時期的傳統藝術也有一定程度的探索與論述。而尾崎在日治前期強調統治與學術相輔相成的研究熱潮中，同時涉獵較少人探索的傳統書畫，因而被推崇為研究臺灣傳統藝術的開拓者。本節希望透過探討這兩位「官學並行」學者如何建構臺灣歷史與書畫知識，以爬梳殖民慣習調查所累積的文化資本與現代展示機制間的關係。

伊能嘉矩，日本岩手縣遠野市人。他於 1895 年 11 月 10 日抵達臺灣，並展開長達十年的殖民地研究寫作生涯。來臺之前，伊能曾在東京擔任報社、雜誌的編輯；1893 年拜東京帝大教授坪井正五郎（1863-1913）為師，從事人類學的研究。隔年，與鳥居龍藏（1870-1953）在東京創立「人類學講習會」，積極投入人類學的探鑽。¹⁰⁴抵臺後，伊能與田代安定（1856-1928）於 1896 年 1 月著手於「臺灣人類學會」的籌組，¹⁰⁵並從 1897 年 5 月開始進行全島性的田野調查。1900 年伊能與粟野傳之丞合著《臺灣蕃人事情》，首先提出依據地理、人口、政治、土俗、慣習、口碑等原則，以建立原住民的分類系統。¹⁰⁶而伊能對於臺灣漢人社會的調查研究，則可追溯至「臺灣慣習研究會」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參與時期。之後，他陸續在《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慣習記事》等報刊、雜誌上，發表研究清代臺灣歷史及文獻的文章。1906 年 1 月返回日本遠野後，伊能仍持續從事臺灣歷史的研究與寫作，並協助編纂臺灣理蕃誌及史料等工作，先後完成《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之部）》（1909）、《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1912）等書，以及遺稿巨著《臺灣文化志》（1928）。

抵臺之前，伊能嘉矩曾撰〈臺灣志〉呈交官方要人與先進諸氏，闡述他渡臺的趣意（宗旨）。他說：「臺灣之住民，今據稱分有三類：曰中國人（即漢人）、曰熟蕃、曰生蕃是也。」他認為治理漢人並不困難，但生、熟蕃則需「詳細研究調查其形而上、形而下後，再講求治教之道」。文中他期許自己，不只為了「學術」

¹⁰⁴ 板澤武雄，〈伊能先生小傳〉，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文化志》（上卷），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 年，頁 15。（1928 年初版）

¹⁰⁵ 同上註，頁 18-19。

¹⁰⁶ 張隆志，〈文化與國家：連橫與伊能嘉矩的臺灣認同與歷史書寫〉，發表於中研院文哲所主辦，「『非關忠誠？』：辨異與認同的文化與政治」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19 日。

研究，也為了「治教」的需求，能運用現代人類學，在「武備之關門」、「殖產之要區」——臺灣，進行新領版圖的調查研究。¹⁰⁷依其趣意書所述，伊能胸懷功能主義人類學知識，強調學術研究與國家的治理教化必須相輔相成，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則將對殖民統治有所裨益。追根究柢，伊能的學術理想實源自其師坪井正五郎，追求的是學術支援政治的實用之道。

被譽為「日本人類學之父」的坪井正五郎，早年曾經留學西方，並參訪人種展示博覽會，因而對西方帝國假藉博覽會陳列殖民地「落後人種」，以及人類學分類、展示邏輯的操作手法，可說十分熟稔。就此，先行學者亦提出批判性的論述，認為日本殖民展示背後的知識架構，實質上受到西方社會進化論文明／野蠻二分法的影響。¹⁰⁸坪井正五郎帶領伊能嘉矩等人，進行 1903 年「第 5 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人類學展示的規劃時，以人種「身分差異」的方法呈現，即透露出他們對殖民地臺灣人種帝國支配的心態。

坪井與伊能對新領地臺灣的凝視與知識建構，究竟如何落實於 1903 年的博覽會展示上呢？他們所想像、架構、展示的又是甚麼樣的臺灣呢？從 1877 年開始，日本共舉行過 4 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圖 9）至 1903 年，因已領有海外殖民地臺灣，故欲以「帝國之姿」，在大阪市天王寺公園舉行的「第 5 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設立「臺灣館」，展示臺灣的相關物品；¹⁰⁹並仿效 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設立「學術人類館」展示實體的「落後民族」。¹¹⁰大阪勸業博覽會人類館的展示企劃，即是由坪井正五郎領導負責。¹¹¹1902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囑託伊能嘉矩則受聘為博覽會委員，負責隔年博覽會「臺灣館」的原住民展示品之徵集、選擇及陳設等籌畫事宜。¹¹²（圖 10）

大阪勸業博覽會從 1903 年 3 月 1 日起為期 5 個月，總共吸引了 435 萬人次觀覽，（圖 11）而「臺灣館」展出的物品共計有 6,028 件，這是日本統治臺灣 8 年後，首次全面而大規模地將殖民地臺灣的民情風俗、物產、史地及現狀等展示

¹⁰⁷ 同註 104，頁 16-17。

¹⁰⁸ 1998 年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学〉，與 2005 年長谷川由希〈アエヌ民族と植民地展示：1903～1913 年の博覧会から〉等文章，都曾討論人類學展示與殖民的關係；參見李政亮，〈帝國、殖民與展示：以 1903 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34。

¹⁰⁹ 李政亮，〈帝國、殖民與展示：以 1903 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31-32。

¹¹⁰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2005 年，頁 113。

¹¹¹ 同註 109，頁 32。

¹¹² 同註 110，頁 121。

給日本國內民眾認識，更是日後臺灣總督府舉辦各種博覽會的範本。¹¹³記者雖然批評「臺灣館」在 14 個展覽館中，建築不夠「宏壯華麗」，(圖 12) 展品稱不上「驚奇眩目」，位置及內部設備和別館相較也「相形見絀」；但因為此館是「戰捷紀念」館，又有「漢番風俗、亞熱帶草木鳥獸和一切奇珍物產」，因而「一般人仍爭相目睹且讚不絕口」。¹¹⁴而「臺灣館」中由伊能嘉矩負責的原住民器物圖錄的展示，更被稱讚規畫的「最為周到」。¹¹⁵(圖 13)「臺灣慣習研究會」提供的「居民偶人」(指蠟像)，更是該館頗獲好評的亮點。¹¹⁶可見總督府所規劃的「臺灣館」，不僅塑造出「戰捷紀念」館的殖民意象，同時也彰顯臺灣亞熱帶人種、風土、物產的異國趣味，成功地吸引參觀大眾的目光。

呂紹理分析，博覽會中的「臺灣館」將各種調查、統計及測繪的成果，以照片、圖表、蠟像、標本等現代展示技術，提供觀眾凝視、窺看臺灣的觀景框架。¹¹⁷博覽會不但宣示日本主權的延伸，還將殖民地納入帝國體系的想像中，殖民者則在這個想像裡大量地複製拆解臺灣元素，製造出「可觀看」(readable) 的臺灣摹本，¹¹⁸展示的是殖民者「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下的臺灣擬象。移植自西方帝國的博覽會，其蒐集、分類、展示及消費的操作技法，不但在 1903 年勸業博覽會被運用來滿足日本的帝國想像，同時也被利用來強調殖民者 / 被殖民者、文明 / 落後的「身分差異」。¹¹⁹臺灣漢人被製成 8 尊與真人等高的蠟像陳列，¹²⁰(圖 14) 臺灣原住民被運往「學術人類館」展示；還有博覽會期間伊能講演「臺灣的人種」，坪井講演「博覽會與人類學」，¹²¹在在都可以看到現代殖民知識與帝國權

¹¹³ 呂紹理，〈展示殖民地：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2003 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交流活動報告書，2003 年，頁 6，引自網路：[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 (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9 日)。

¹¹⁴ 木村地夫，〈博覽瞥見記(五)：臺灣館〉，《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¹¹⁵ 〈大阪博覽會對本會展示品之評論〉，《臺灣慣習記事》第 3 卷第 4 號，1903 年 4 月，頁 215；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2005 年，頁 134。

¹¹⁶ 〈臺灣館出品〉，《臺灣協會會報》，1903 年 5-6 月，頁 10；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2005 年，頁 139。

¹¹⁷ 呂紹理，〈展示殖民地：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2003 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交流活動報告書，2003 年，頁 13，引自網路：[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 (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9 日)。

¹¹⁸ 同上註，頁 14。

¹¹⁹ 李政亮，〈帝國、殖民與展示：以 1903 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33。

¹²⁰ 同註 110，頁 128。

¹²¹ 李政亮，〈帝國、殖民與展示：以 1903 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33。

力介入博覽會機制，進行文化統治的運作模式。而人類學家的殖民地歷史、地理、風俗、人種等研究所建構的臺灣知識，經轉化為博覽會中被分類、揀選、陳列的「落後文明」複製摹本，突顯的是帝國對邊境臺灣「他者化」(othering)的權力建構過程。

伊能嘉矩 1906 年返回故鄉遠野所完成的《臺灣文化志》，被譽為日治時期研究清代臺灣史的巔峰之作，同時也是伊能研究臺灣歷史 30 年所累積的成果。伊能運用大量清朝文獻、時人著作以及報刊資訊，從文化角度切入，剖析、書寫臺灣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交通、對外關係、風土民情、拓墾及理番等不同的面向。《臺灣文化志》是在伊能嘉矩門生板澤武雄(1895-1962)與民俗學家柳田國男(1875-1962)的奔波下，¹²²將其遺稿重新編輯、校對後，於 1928 年付梓刊印。1941 年歷史學家楊雲萍(1906-2000)曾撰文，稱伊能是「臺灣研究之碩學」，但也批評《臺灣文化志》「直接記述臺灣文學者只有第三章」，是「最考究不足的部門」，因而讓他感到「最不滿意」。¹²³然而伊能在書中所論述清朝的臺灣文學與藝術，仍有一定筆路藍縷的歷史意涵；至於他對臺灣傳統文藝史的書寫動機與建構的知識內容為何？則是我們檢視殖民歷史學家伊能嘉矩的重心所在。

黃美娥認為伊能在《臺灣文化志》中建構的清代臺灣文學知識，側重於描述清代「在臺官員的教育政績與功效」，顯然是從「教化」角度出發。¹²⁴伊能於《臺灣文化志》第二章〈教學之鼓勵與藝文之振興〉中，即肯定清朝治臺兩百年，官方及民間都致力於「教學之鼓勵」與「藝文之振興」。¹²⁵第三章〈右文間接之影響〉，則論述臺灣自古以來就有「寓賢隱逸之士」，結社吟詠，立言著書，故民間原本具有發揮「副國家養士之隆，右文之化」的影響力。¹²⁶易言之，伊能藉由形構「一個頗具教化傳統與涵養」的臺灣意象，¹²⁷不斷強調納入帝國版圖的臺灣，從兩百年前起即是可被教化的「海東之鄒魯」。¹²⁸而這種帶有強烈國家主義的學術研究動機，從前文所述，即已見到伊能承襲坪井的帝國擔負殖民地「治教」重責的表述。

¹²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編輯，《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 年，頁 29。

¹²³ 楊雲萍，〈臺灣研究の碩學——伊能嘉矩〉，《臺灣時報》第 253 期，1941 年，頁 76-77。

¹²⁴ 黃美娥，〈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台灣文學〉，《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3 年，頁 19。

¹²⁵ 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文化志》(中卷)，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頁 37。

¹²⁶ 同上註，頁 49。

¹²⁷ 同註 124，頁 20。

¹²⁸ 同註 125，頁 49。

另外，伊能也延續其人類學社會進化論的觀看角度，將被「他者化」的臺灣文藝，經對照分類及歸納分析，尋求臺灣特殊風土所孕育的珍奇趣味，以建構出地方與中央的「身分差異」。《臺灣文化志》第七章〈人文之特殊發展〉，即剖析臺灣漢人在獨特的地理空間生活，衍化出與福建、廣東原鄉不同的本地文化，產生與中國同中存異的文學創作。¹²⁹而這種「臺灣趣味」的強調，則是日人領臺後，在人類學田野調查與舊慣調查所建構的臺灣知識中，一再被論述、探討的議題。伊能曾於《臺灣慣習記事》中，以短語抒發閱讀王松（1866-1930）所餽贈的《臺陽詩話》二卷後的感言，認為該書「行文雅潔，詩趣豐富」，並在「文學上發展臺灣趣味，將為漢文學另闢新風貌」。¹³⁰黃美娥即批判，伊能這種單面向討論《臺陽詩話》所蘊含的「臺灣趣味」，而刻意忽略王友竹蘊藏在詩話中深沉的遺民「滄桑感慨」，突顯的是伊能嘉矩內在「帝國主義位階式的思考」。¹³¹

（三）尾崎秀真的書畫鑑賞與獨特的臺灣史觀

另一位曾參與慣習調查事業，並對「臺灣趣味」多所論述的殖民官員學者尾崎秀真，其觀點與論說，及對臺灣傳統藝術的建構，後續亦產生漣漪不斷的影響力。尾崎秀真，日本岐阜縣人，字白水，號古村。¹³²年少時習醫，但更醉心於漢詩及漢文，之後即棄醫從文。¹³³1893年奔赴東京後，尾崎擔任日本《醫海時報》、《報知新聞》的記者、編輯及主筆。大約於此時，他認識了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¹³⁴1900年經由後藤的介紹，尾崎來臺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主筆。¹³⁵1908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開館時，尾崎與伊能嘉矩、森丑之助（1877-1926）合作規劃該館的歷史室陳列展。¹³⁶

由於尾崎秀真個人專擅收藏、鑑賞書畫及古代器物，¹³⁷滯臺期間從1901年

¹²⁹ 同註 125，頁 118。

¹³⁰ 梅陰生（伊能嘉矩筆名），〈慣習日記〉，《臺灣慣習記事》第 6 卷第 1 號，明治 39 年（1906 年）1 月 23 日，頁 95。

¹³¹ 同註 124，頁 20。

¹³²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 376 期，2006 年 9 月，頁 493。

¹³³ 李子寧，〈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尾崎秀真的歷史與原住民收藏〉，李子寧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8 年，頁 37。

¹³⁴ 同註 132，頁 493-494。

¹³⁵ 同註 133。但施翠峰則說尾崎秀真是 1901 年來臺。（同註 132，頁 494）

¹³⁶ 同註 132，頁 36。

¹³⁷ 楊雲萍說：「尾崎不但是當時臺灣最大的收藏家，即使在全日本也是第一流的收藏家。……他收藏範圍很廣，包括：臺灣古代的書畫及檔案、圓山貝塚發掘的石器、高山族的原始藝術品及用具，……還有我國明、清兩代的書畫及日本名家作品」。（楊雲萍、施翠峰，〈臺灣古書畫、古玩收藏對談〉，《臺灣風物》第 21 卷第 3 號，1971 年 8 月，頁 14。）

起至 1932 年，先後參與「淡水館」月例會、「臺灣書畫會」、「翫古會」¹³⁸及「趣味同人會」¹³⁹等書畫古玩的賞析活動，因而結識眾多日、臺籍鑑賞家與藝術家。

「臺展」開辦之前，尾崎就經常撰文評鑑或論述臺灣過去與現在的藝術發展狀況。

1922 年尾崎自《臺灣日日新報》退休後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¹⁴⁰負責撰寫「臺灣太古史」；¹⁴¹（圖 15）1925 年改任內務局囑託；¹⁴²1926 至 1928 年則出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囑託；並於 1927 年至 1929 年期間，受聘為「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委員，而參與「蕃族參考品蒐集計畫書」的擬定。此計畫兩年內，為博物館一共蒐集到 1,760 件藏品，而其中有 381 件原住民與平埔族的文物，則是由尾崎收集入藏。¹⁴³

由於尾崎秀真滯居臺灣 45 年期間，除了擁有豐富的個人收藏，還積極參與官民團體的書畫藝術活動，並受總督府博物館委託規劃歷史展示與典藏重責，因而他對史前、荷蘭、鄭氏、清朝及同時期臺灣的傳統藝術文化的發展，具備豐富的調查經驗與撰述能量。他於 1912 年 9 月初至 1913 年 10 月底，曾在《臺灣日日新報》「古今書畫名蹟」專欄，連載 175 篇介紹江戶及清朝時期日本、中國及來臺知名藝術家作品。其中，尾崎大力讚揚寓臺書畫家謝曦（1828-？）、呂世宜（1784-1855）及謝琯樵（1811-1864）（圖 16）等人的作品。而這批被尾崎所介紹、評論的書畫，都是他親自過目並鑑賞過的名家之作。¹⁴⁴

1925 年 3 月至 10 月，他在《臺灣時報》連載 8 篇〈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首度提出他對臺灣歷史發展久遠的觀點，認為藉由世界上年代最古老的文獻（尚書），足以證明臺灣在 4200 年前的歷史文獻中即已存在。¹⁴⁵1926 年 11 月，尾崎又在《臺灣時報》發表〈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主張「在日本內地，研究史前稱為考古學研究，但在臺灣並不叫考古學。因為是直接研究生蕃，或者說居

¹³⁸ 同註 132，頁 494-495。

¹³⁹ 胡家瑜編著，《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圖錄》，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頁 14。

¹⁴⁰ 同註 132，頁 494。

¹⁴¹ 同註 133，頁 37。

¹⁴² 鍾淑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尾崎秀真〉，《臺灣人物誌》，頁 9；引自 <http://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512910131463.pdf>（瀏覽日期：2016 年 7 月 7 日）。

¹⁴³ 同註 133，頁 37-38。

¹⁴⁴ 尾崎秀真從 1912 年 9 月 4 日起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第三版，開闢「古今書畫名蹟」專欄。首篇介紹「南宗畫界泰斗」田能村直入(1814-1907)，開宗明義地表明他對文人書畫的推崇。「古今書畫名蹟」專欄前後歷時一年有餘，至 1913 年 10 月 24 日發表了第 175 篇評介，才畫下最終的句點。

¹⁴⁵ 同註 133，頁 37。

民所使用的器具和其他標本，因此稱之為博物學研究也不為過」。¹⁴⁶文中他認為從史前時期開始，臺灣「生蕃」就一直定居於島上，因而研究「生蕃」居民的器具與出土標本，是「博物學研究」而非「考古學研究」。他又說：「我也把臺灣叫做常世之國……上面住著與日本同種族的夷族。關於這一點，只要日本的大和民族不是北方人，就能證明臺灣在很久很久以前即是日本的領土；同時，我也想試著證明，基隆與長崎港從三、四千年前就已經交流頻繁」。¹⁴⁷顯見尾崎對臺灣歷史的論述，與多數早期殖民地官學者一樣，還是跳脫不了從種族、領土或交流的層面，主觀地將自古以來的臺灣與日本作一統帝國的連結。

1926年11月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出版第一本展示內容手冊——《臺灣博物館の手引》，即引用尾崎的史觀，並將其轉化為博物館歷史室的展示主軸。¹⁴⁸《臺灣博物館の手引》是由館員松倉鐵藏編著，並由囑託尾崎秀真校閱。歷史部門說明之下共分為：「概說」、「臺灣古代史觀」、「臺灣的石器時代」、「關於貝幣貨幣」、「古代日本民族的南方關係」、「指掌型古磚相關考察」、「臺灣的文藝相關人物」、「近代日本人的南方經略」與「明治時代的臺灣關係」，共九個單元。各個單元的內容，明顯地反映出尾崎秀真個人獨特的臺灣史觀。¹⁴⁹博物館在歷史部門的清代文人書畫之收藏展示，當時也大都由尾崎所規劃，而這方面的藏品部分亦屬於他個人的捐贈品。¹⁵⁰可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1920年代，相當倚重尾崎秀真的藝術鑑賞品味與臺灣歷史知識。但1930年代，當臺北帝國大學歷史、考古專門學科的學者，紛紛提出學術研究見解後，尾崎對臺灣歷史的詮釋權顯然已旁落他人之手。李子寧認為，尾崎秀真以「博物學」方法提出的臺灣史前史的假說，最終並沒有成為總督府的官方論點，也未能獲得同時代其他學者的認同與接納。¹⁵¹但尾崎的「歷史主體」指向「原住民與中國」，並強調臺灣有「輝煌的過去」及「墮落的現在」；明顯與1930年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展示，將主體「轉移至

¹⁴⁶ 尾崎秀真，〈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臺灣時報》第84期，1926年，頁51-72；譯文引自李子寧，〈臺灣博物館與歷史展示——從總督府博物館到省博初期的變遷（1920~1960）〉，頁3，引用自網路

<http://www.ntm.gov.tw/upload/download/20120327/a84a51c2-fb4a-4fc8-aa36-b33067bcbf44.pdf>（瀏覽日期：2016年7月8日）。

¹⁴⁷ 同上註，頁5。

¹⁴⁸ 同上註，頁5-11。

¹⁴⁹ 李子寧，〈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頁19，引用自網路 <http://www.ntm.gov.tw/upload/download/20110128/667f2c39-2c6e-4873-83f8-e73e6a150e0a.pdf>（瀏覽日期：2016年6月8日）。

¹⁵⁰ 同上註，頁20。

¹⁵¹ 同註133，頁38。

日本」，彰顯「臺灣雖有著悲慘的過去，卻有著光明的未來」有所不同。¹⁵²

1927年之後，尾崎秀真仍持續參與許多臺灣民間大型書畫比賽的評審工作，以及重要書畫作品圖錄的編輯。1930年，為了紀念荷蘭人興築熱蘭遮城300年的「臺灣文化三百年展」，(圖17)尾崎秀真被聘為顧問，同時發表〈清朝時代の臺灣文化〉。1938年，他又在《愛書》發表〈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藝〉(清朝治理下的臺灣文藝)。1930年代的兩篇文章，尾崎還是運用「博物學」方法，分析、建構他對清朝臺灣文藝的獨特觀看。其晚期的論述，更加強調臺灣文藝乃是在日人富強國力的支配下，始得以邁向發達進步。可見隨著戰爭的白熱化，尾崎洋溢著帝國主義色彩的書寫策略日趨表露無遺。由於尾崎1930年代的書寫，已超出本文在時間上的界定，故當另文討論之。

五、結論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因追求西化文明而國勢日強，同時也萌生效法西方帝國的作為，企圖擴張疆域、殖產海外，以建立東洋盟主的永久霸業。臺灣無論地理形勢、人種類別或文化淵源，都與日本相近，因而給予維新知識菁英收編為國家領地的想像空間。征臺之役(牡丹社事件)、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即是日人南向拓展疆域及爭取經濟利潤所發動的戰役。

這個東亞新帝國剛上路時，將第一個奪取的新領地臺灣視為南方「邊境」，並形成以此島為帝國「防衛」與「殖產」據點的共識。1895年佔領臺灣前後，日本內地意見領袖及殖民地官學者紛紛從不同角度凝視、想像和模塑臺灣，以連結帝國中央與臺灣邊境的關係，並提出個人對新領地臺灣的認知與治理的意見。統治初期，日人因從無海外殖民經驗，故對應視臺灣為內地一省，採「急治」(積極同化)；或視臺灣為殖民地，採「漸化」(消極同化)的治理方針，可謂舉棋難定。直至以後藤新平為核心的「兒玉・後藤體制」形成後，遵循「無方針」、「尊重舊慣」及「生物學」的統治原理，展開舊慣調查事業，方才奠定日後殖民統治的礎石。

日人對臺灣地理形勢、自然物產、人種族群、固有慣習及民風習俗等的勘查工作，早在1895年佔領臺灣之前，即已由軍方、外交人員聯手進行。領臺後，官學者亦投入慣習調查的行列。而1901年臺灣總督府挹注大量資源並成立專責機構，推動全面性的舊慣調查工程，使得臺灣知識的建構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

¹⁵² 同註149，頁23。

迅速邁入體系化的階段。臺灣舊慣知識的建立，雖是作為殖民政權擬定施政方針的重大參考；但是卻也藉由臺灣私法、清朝行政法及番族慣習調查的成果，建構起豐富、多元的臺灣知識。而殖民官學者在詮釋、運用這一系列，結合傳統漢學與現代知識的文化資本，從事歷史書寫或展覽陳列時，往往表露出共通的或個人獨特的帝國凝視理論。例如，蘇來、小松吉久在參與慣習調查後，認知到臺灣存在多元、混雜及趣味的文化特質，與日本或中國截然不同。蘇來更倡議，內地藝術家應採擷特有「臺灣風物」元素，創作出足以拓展日本藝術領域的新契機。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者伊能嘉矩，認同調查研究與帝國「治教之道」的關係，並積極參與內地博覽會的展示規劃與演講。透過現代展覽與展示技術，將充滿異國趣味的臺灣人種、風土、物產帶到觀者眼前，以滿足殖民者窺看的慾望與霸權的想像，則是伊能與其師坪井正五郎所追求學術支援政治的應用之途。臺灣歷史書寫者與書畫、古董鑑賞家尾崎秀真，擅長引領讀者與觀者進入其所建構的歷史陳列情境或鑑賞藝術品。然而他立基於現代「博物學」與殖民論述，挑選、過濾後所架構出來的史觀與鑑賞品項，則難跳脫帝國主義者觀看的狹隘視野。

1927年「臺展」開辦之前，根基於慣習調查建構的系統化臺灣知識，提供殖民書寫者與各種展示機制豐沛的文本與各類型資料。¹⁵³臺灣在帝國的凝視下，充斥殖民觀點與政治修辭的文化論述，亦源源不斷在殖民官方的報刊雜誌上散布流通。蘇來所引用的後藤宙外之「文壇地方分權」說，或者所強調的「臺灣風物」元素，小松吉久、伊能嘉矩所主張發揮「臺灣趣味」，顯然都對日後「臺展」標舉「帝國異彩」、「南國美術」、「臺灣特質」，甚至是「地方色彩」的口號，產生後續的漣漪效應。換言之，臺灣特殊化、地方化的殖民邊境地位，早在「臺展」開辦之前，即已在帝國臺灣知識建構的工程中啟動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參考書目

¹⁵³ 有關日人所建構系統化的「臺灣知識」之視覺影像，包括國語讀本、舊慣調查報告、臺灣八景，以及各式紀念會、博覽會中的攝影、繪葉書、海報及插畫等，將另文討論日人在「臺展」之前，如何將基礎的「臺灣知識」轉化為文化資本。

小松吉久，〈殖民地文學——臺灣趣味の發揮〉，《臺灣慣習記事》第 5 卷第 10 號，1905 年 10 月，頁 1-5。

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經典研讀會譯，《「日本人」的國境界》，嘉義縣民雄鄉，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11 年。

山根幸夫，《論集近代中國□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 年。

尹健次，〈明治前期 国民形成論の展開—伊沢修二の教育思想にみるその一研究—〉，《教育学研究》第 49 卷第 2 號，1982 年 6 月，頁 195-204。

木村地夫，〈博覽瞥見記（五）：臺灣館〉，《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月出皓編，《臺灣館——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無頁碼。

王秀雄，〈日據時代臺灣官展的發展與風格探釋——兼論其背後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 年，頁 287-330。

王淑津，〈高砂圖像——鹽月桃甫的臺灣原住民題材畫作〉，《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 116-14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東京，原書房，1965 年。

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文化志》（上卷），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 年。（1928 年初版）

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文化志》（中卷），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1928 年初版）

伊沢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沢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 年。

伊沢修二，〈我國體を論じて大日本國家教團設立の精神に及び〉，《樂石叢誌》第 8 卷，1912 年 2 月，頁 3。

伊沢修二，《伊沢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年。

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台灣資料》，臺北，秘書類纂刊行會，1936。

米地文夫，〈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キマイラ的性格とその景觀認識〉，《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報》第 56 卷第 1 號，1996 年 10 月，頁 15-34。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2005年。
- 李子寧，〈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尾崎秀真的歷史與原住民收藏〉，李子寧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8年，頁36-39。
- 李政亮，〈帝國、殖民與展示：以1903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20卷第2期，2006年，頁31-46。
- 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東京市，文武堂，1901年。
- 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年。
- 《風俗畫報臨時增刊臺灣征討圖繪》第1輯第98號，東京市，東陽堂，1895年。
-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9年，頁199-252。
-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376期，2006年9月，頁493-497。
- 胡家瑜編著，《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圖錄》，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編輯，《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年。
- 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陳青松編撰，《基隆古典文學史》，基隆市，基隆文化局，2010年。
-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12卷第1期，2001年，頁115-155。
- 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一）〉，《臺灣風物》第41卷第1期，1991年3月，頁87-103。
- 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二）〉，《臺灣風物》第41卷第2期，1991年6月，頁71-94。
- 張惟綜，〈日本國體論—從幕末至明治—〉，《育達科大學報》第28期，2011年9月，頁77-98。
-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統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頁33-58。
- 張隆志，〈文化與國家：連橫與伊能嘉矩的臺灣認同與歷史書寫〉，發表於中研

- 院文哲所主辦，「『非關忠誠？』：辨異與認同的文化與政治」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19日。
- 張良澤、高坂嘉玲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全島卷（下）》，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年，頁14-15。
- 黃美娥，〈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台灣文學〉，《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3年，頁1-26。
-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
- 《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1年。
-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
- 楊秀芳、蘇碩斌、黃美娥等人著，《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楊孟哲，《日治時代臺灣美術教育（一八九五～一九二七）》，臺北市，前衛，1999年。
- 楊素霞，〈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33期，2006年9月，頁125-150。
- 楊雲萍，〈臺灣研究の碩學——伊能嘉矩〉，《臺灣時報》第253期，1941年，頁73-77。
- 楊雲萍、施翠峰，〈臺灣古書畫、古玩收藏對談〉，《臺灣風物》第21卷第3號，1971年8月，頁13-19。
-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
-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出版之書畫圖錄〉，《臺灣學研究》第18期，2015年12月，頁17-52。
- 廖瑾瑗，〈木下靜涯（1887-1988）與臺灣近代畫壇——以台展、府展的東洋畫部為中心〉，《膠彩畫之淵源、傳承及其影響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暨研討紀錄》，臺中市，臺灣省立美術館，1996年，頁43-63。
- 臺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
- 《臺灣時報》，大正3年12月號，1914年12月。
- 《臺灣時報》，昭和2年5月號，1927年5月。
- 《臺灣時報》，昭和2年11月號，1927年11月。
- 《臺灣協會會報》，東京，臺灣協會，1903年5-6月。

《臺灣日日新報》，古今書畫名蹟（四十六），1912年（大正元年）12月22日，第3版。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昭和5年）10月27日，第7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1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年1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2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年2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10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年。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12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2年。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第4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3年4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4卷第1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4年1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4卷第3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4年3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5卷第9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5年8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6卷第1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6年1月。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第7卷第8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7年8月。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十二卷》，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6年，頁80-81，第10版。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28年乙種永久，第4門，文書（報告・民政局），第7卷，明治28年（1895年）9月18日。

增野恵子，〈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の挿図に関する報告〉，《非文字資料から人類文化へ—研究参画者論文集—》，神奈川大學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研究推進會議，2008年，頁101-115。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市，博揚文化，

2005 年。

鄭樑生主編，《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水，淡江大學歷史學系，1993 年。

岡松參太郎，《緒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 1 卷第 1 編，1918 年。

顏娟英，〈台展時期東洋畫的地方色彩〉，《臺灣東洋畫探源》，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0 年，頁 7-18。

薛化元編輯，《近代化與殖民》，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藍弘岳，〈「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51-203。

鶴見祐輔編，《後藤新平》第 1 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年，頁 912-914。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6-7.

Tomoko Sato and Toshio Watanabe ed.. *Japan and Britain: An Aesthetic Dialogue 1850-1930*. Lund Humphri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91, p.84.

呂紹理，〈展示殖民地：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2003 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交流活動報告書，2003 年，引自網路，[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https://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2c11a7a88aa171b449256798000a5805/9638d8f8ccb6b95249256eee0019c211/$FILE/lushaoli.pdf)（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9 日）。

李子寧，〈臺灣博物館與歷史展示——從總督府博物館到省博初期的變遷（1920～1960）〉，引用自網路
<http://www.ntm.gov.tw/upload/download/20120327/a84a51c2-fb4a-4fc8-aa36-b33067bcbf44.pdf>（瀏覽日期：2016 年 7 月 8 日）。

李子寧，〈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引用自網路
<http://www.ntm.gov.tw/upload/download/20110128/667f2c39-2c6e-4873-83f8-e73e6a150e0a.pdf>（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志賀重昂，《南洋時事》，東京，丸善商社書店，1889 年，增補第 3 版。引自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南洋時事網站：

<http://school.nijl.ac.jp/kindai/HRSK/HRSK-00047.html#156>（瀏覽日期：2015年10月4日）。

《浮世繪檢索》部落格，「歌川国明」，網址：<https://ukiyo-e.org/image/mfa/sc11160>（瀏覽日期：2016年8月2日）。

陳萱，〈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之起源——以牡丹社事件之紀錄為中心〉，《原住民族文獻》第17期，2014年，引自「原住民族文獻」網站，網址：<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4&id=815>（瀏覽日期：2016年1月25日）。

鍾淑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尾崎秀真〉，《臺灣人物誌》，頁9；引自<http://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512910131463.pdf>。（瀏覽日期：2016年7月7日）漢珍數位圖書，「臺灣人物誌」網站<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ervlet/ShowService?&path=ftimg/&title=10/1018202.pdf>（瀏覽日期：2016年6月15日）。

<http://www.twmemory.org/?p=vnizoolu&paged=68>（瀏覽日期：2016年6月12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